



北大教育经济研究 (电子季刊)
Economics of Education Research (Beida)
北京大学教育经济研究所主办
Institute of Economics of Education, Peking University

第2卷第1期
(总第2期)
2004年2月

主编：闵维方；副主编：丁小浩 闫凤桥；

本期执行主编：岳昌君

关于农民工培训提供机制的案例研究

李湘萍（北京大学教育经济研究所 100871）

关于农民工培训提供机制的案例研究

李湘萍(北京大学教育经济研究所 100871)

一、农民工培训现状

职业培训在帮助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就业方面作用重大,但我国目前农民工职业培训却是“有效供给不足”和“需求不旺”现象并存。

1、“有效供给不足”

首先,用工企业是我国目前农民工培训的主要提供者,企业大多采用成本较低的学徒制方式对农民工进行培训,也有少数企业拥有相对正规的培训部门,但大多数的培训内容是关于企业内部纪律和规范的教育,使用的专业技能培训很少。由于劳动力市场的分割及农民工自身素质的局限,大部分农民工分布在次要劳动力市场,就业于各种非正规部门的中小企业,在企业追逐利润的前提和经营压力下,在政府还没有对实施农民工职业培训的企业进行自主的情况下,众多农民工就业的中小企业不愿意或难以独立地承担企业内农民工培训的任务^{①②}。

其次,大部分农民工不能够或不愿意参加政府公共机构提供的培训;政府下属的教育、劳动等公共培训机构所提供的培训,一方面尚未覆盖到进城农民工这一特殊群体,一方面培训的内容和形式与市场

^①周其仁,“机会与能力——中国农村劳动力的就业与流动”,《管理世界》,1997年第5期

^②王建《技术进步、技能需求与教育培训研究》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博士学位论文,2001年

及农民工的需求尚存距离；以公共职业教育培训体系为例，我国职业教育和培训体系主要包括职业学校教育和职业培训两部分，职业学校教育分为初、中、高三个层次，其特点是学制长、有系统性，但这种以学校为本的职业教育体系强调供给忽视劳动力市场需求，而大多数初中或初中以前辍学的农民工需要的是具有针对性、实用性、与就业紧密相关的职业教育；而职业培训体系中，政府主要为国有企业职工和在正规部门就业的人群制定培训政策并提供财政支持，针对在非正规部门就业的农民工这一特定人群，国家的职业培训政策显得滞后，或是有政策但因缺乏有效的实施而流于形式化的执行；^①有专家认为“由政府提供的免费培训主要针对城镇下岗人员，农村劳动力根本无法享受，这造成了培训机会实质上的不平等。”^②

再次，新兴的民办专业培训实体的迅速成长为农民工接受培训提供了一个可能的渠道，但就目前的情况来看，农民工进入民办培训机构的比例很低，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多数的民办培训机构坚持以营利为目的，较高的培训费用成为农民工接受培训的“经济门槛”。^③

综上所述，营利性组织（用工企业、营利性的民办培训机构）和政府是目前农民工培训的主要提供者，但由于经济和制度分割等因素的存在，导致农民工难于从这些组织和机构获得自身需要的、能够制服得起的职业培训，即农民工培训存在着“有效供给不足”的现象。当营利性组织及政府在农民工培训提供方面“做不好、不愿做”时，

^①王良娟 《政策的形式化执行——制度变迁中的农民工培训》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硕士学位论文，1998年

^②谭新鹏，“谁为农民工培训买单”，《中国青年报》，2002-11-4

作为文明社会三大组成部分的非营利组织可以有所作为,改善农民工培训的“有效供给不足”,成为培训的提供实体之一。

2、“需求不旺”

按照人力资本理论的假设,在充分竞争的自由时常上,较高的人力资本会带来较高的收益,而教育和培训是提升人力资本的重要途径,因此出于提高预期收益的目的,人们具有投资于教育培训的兴趣和意愿。从个人的需求来看,进城农民工大多具有接受培训的愿望,虽然他们的教育背景要好于农村劳动力的平均水平,但相对于城市用工企业的需求来讲,进城民工的技能准备还显不足,特别是当个人谋求更进一步的发展时,这种对于培训的需求更为强烈。

但现实中,农民工对职业培训的需求却远没有理论所设想的那样旺盛;导致农民工对职业培训“需求不旺”的因素很多,这里仅从以下两方面说明:第一,职业培训的“经济门槛”过高,面对“为什么不去接受培训”这样的提问,大多数农民工回答“掏不起钱”。无论是职前还是在职的培训,价格不菲的培训费用大多由农民工支付,对于众多进城农民工尤其是尚未就业的农民工,他们不具备这样的支付能力;第二,职业培训的“预期收益”不明朗,由于劳动力市场状况及外在的制度因素,农民工接受职业培训并不一定能带来近期收入的提高,例如农民工主要在非正规的次级劳动力市场卖“苦力”,劳动数量强度是工资的决定因素,技术并不能带来明显的增收,另外由于目前的户籍等制度的限制,农民工在城里打工也知识暂时行为,身份依然是农民,工作、居住都有相当大的不确定性,种种不明朗、不确

定性限制了他们投资培训的积极性^①。

由上所述,所谓的“需求不旺”是在众多限制因素存在下的一种“虚伪的需求不旺”,在逐步排除制度障碍、进一步完善培训市场的条件下,农民工的培训需求会越发旺盛起来。

二、富平学校在农民工培训方面的作用

1、富平学校简介

本研究选取“北京市通州区富平职业技能培训学校”(下称“富平学校”)作为农民工培训提供机制研究的案例。“富平学校”是由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軾、汤敏等人出资于2002年初在北京创立的,创办富平学校是茅于軾、汤敏等人关注三农问题,扶持社会弱势群体的体现,他们根据在山西十年的小额信贷扶贫经验,从提升人力资本、创造就业机会的角度,开创新的扶贫形式,富平学校就是他们扶贫理念的延续和新的实践方式。从学校性质来看,它是公民个人利用非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面向社会举办的股份制有限责任中级职业技能培训学校,目前学校只开设家政培训专业,为学员提供为期一个月的三个层面(基本知识、一般技能和心理调适)的集中培训。富平学校的特点在于:第一,培训对象主要针对贫困地区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扶贫帮困是学校的主要目标。第二,富平学校是非营利组织(nonprofit organizations),富平学校既不属于政府公共部门,又不属于以营利为目的的组织,富平学校的运营收入全部用于机构自身发展及扶贫项目,股东不参与分红。第三,富平学校将培训与就业紧密结合,完全

^①刘开明著,《边缘人》,新华出版社,2003年

采用市场化的操作方式；富平学校在创立之初只负责培训，但在发展过程中，逐步探索出培训与就业结合的“一条龙”的运作方式，采用面向市场的操作方式，自主经营，风险自负，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富平应该赢利且必须赢利。第四，富平学校与政府合作，具体而言，在招生环节上，富平学校与农民工流出地政府合作招生，在就业环节上，富平学校与农民工流入地政府合作解决就业问题。

富平学校发展的二个阶段

	第一阶段(2002.3-2002.10)	第二阶段(2002.10-2003.12)
主体	富平学校	富平学校、富平家政中心
职能	培训	培训+就业
目标	扶贫	扶贫+市场(商业性)
机构	董事会——学校 └── 招生部 └── 培训部	董事会——富平学校(培训) └── 家政中心(就业)
招生方式	个人宣传	与政府合作，集体招生
生源	全国各地下岗女工、 农村妇女、中专毕业生	以安徽贫困地区农村女性为主
培训人数	约150人	约2000人
就业方式	由北京乐雅家政公司分配就业	由富平家政中心分配就业

(资料来源：根据多个资料编制而成)

2、富平学校在农民工培训方面的作用

富平学校是全国第一个非营利、以扶贫为目标的民办家政培训学校。自2002年成立以来，富平学校在农民工的培训与就业服务方面逐渐摸索出一套独特的发展模式，可以称之为“富平模式”；所谓“富平模式”是一种“民办公助”的培训—就业—权益保障一体化的农民工培训就业新模式，“民办公助”模式中，“民办”指的是富平学校是由茅于軾等人利用非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创办的面向社会股份制有

限责任的培训学校,在产权和管理体制上,富平学校与公办的职业培训学校有着质的不同;“公助”指的是富平学校在招生方面得到安徽省政府(具体为扶贫办公室)的帮助,在就业方面得到北京市政府(具体为民政局下属的北京市社区服务中心)的支持。“富平模式”是农民工培训供给模式的一次制度创新,它的意义在于在经济转轨以及工业化城市化并进过程中,在政府及营利性企业不能或不愿提供农民工培训的情况下,富平学校作为一个以扶贫、促进弱势人群就业为目标的非营利组织成为农民工培训的供给主体,尤其是在当前农民工培训提供机制初创和亟待完善的时期,“富平模式”的示范和创新意义显得非常突出。在富平这样一个目标高度认同的事业共同体内集聚了一批志同道合的精英:颇具公信度的创办人、精于市场化运作和具备较强社会活动能力的管理层;富平作为一个独立的非营利组织,但并不孤立发展,“富平模式”的一个主要创新就在于它实现了部门合作,尤其是富平与政府部门的合作,部门之间的合作可以动员社会各方资源,实现优势互补,最终优化配置了各种资源,以实现富平事业的既定目标。下面将从经济学、政治学和社会学的相关理论出发,探讨富平学校及其所代表的农民工培训新模式的意义。

首先,经济学理论可以解释富平学校存在的必然性和必要性;富平学校是为农民工这一相对弱势人群中的更为不利群体(即农村妇女)提供低端劳动力市场上所需要的技能培训(即家政培训),从扶贫帮困的目标及较低的培训费用和较优惠的学费缴纳方式等来看,富平学校承担了政府的部分责任,所提供的针对农民工的培训服务具有

公共产品的性质和正的外部性;但是目前我国的公共教育培训体系尚未覆盖到农民工这一相对经济不利人群,而营利性企业出于成本—收益的考虑或自身能力的限制也没有为农民工提供职业培训,因此,

“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同时出现,造成农民工培训的“有效供给不足”;按照美国经济学家伯顿·韦斯布罗德(Burton A. Weisbrod)的“政府失灵”理论解释,当“政府失灵”出现时,就需要非营利组织在政府之外提供公共物品,政府和非营利组织在提供公共物品上是互补关系^①。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当市场制度和政府制度在提供公共物品时存在交易成本都过高、都存在着失灵的情况下,非营利组织能够在节约交易成本的前提下,更有效地提供公共物品,因为非营利组织具有非营利性、志愿性和事业目标高度认同等特点^②。在农民工培训的提供方面,富平学校作为一个非营利组织的优势恰好弥补了政府的不足,富平学校不像政府组织只关心大多数中位选民的需求,它能关注特定人群如农民工的需求,政府的过于科层化的组织特征常常使其提供的服务脱离市场需求,富平学校市场化的运作能够为农民工提供培训—就业一体化的服务。

其次,政治学中的民营化理论可以解释富平与政府合作的“民办公助”模式是符合新公共管理潮流和公平效率原则的;民营化即“更多依靠民间机构,更少依赖政府来满足公众的需求”,根据民营化大

^① Burton A. Weisbrod, "Toward a Theory of the Voluntary Nonprofit Sector in a Three-Sector Economy," in E. Phelps, ed., *Altruism Morality and Economic Theory* New York: RUSSEL sage, 1974; 转引自田凯, “国外非营利组织理论述评”, <http://www.npo.org.cn>, 2002; 王绍光著, 《多元与统一——第三部门国际比较研究》, 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9年, P31-33。

^② 赵黎青著, 《非政府组织与可持续发展》, 经济科学出版社, 1998年, P199-208; 郭于华等著, 《事业共同体——第三部门激励机制个案探索》, 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9年。

师 E. S. 萨瓦斯(E. S. Savas)的解释, 在政府主导型的公共服务提供模式逐渐淡出的情况下, 民间机构(包括非营利组织)介入公共服务的提供并与政府达成一种合作伙伴关系, 可以促进公共服务被更有效率地提供; 萨瓦斯认为公共物品的提供机制可以有多种安排形式, 如合同承包(政府出资购买私营部门生产的服务)、凭单制(私营部门提供具有公共品性质的产品时, 政府对该私营部门给予的补贴)等^①, 富平学校的“民办公助”模式则综合了包括合同承包、凭单制及志愿服务等多种民营化的具体形式; “富平模式”的实践表明非营利组织在提供类似于农民工培训这样具有公共品性质的服务方面具有重要作用, 同时也真实体现了萨瓦斯所描述的公私合营的伙伴关系, 这种合作伙伴关系在“富平模式”中代表的是双赢互惠的关系, 政府(包括流出和流入地政府)、农民工、富平学校都从中获益。

再次, 社会学中社会资本理论可以解释“富平模式”在积累社会资本方面的积极作用; 富平学校自诞生以来, 以其颇具社会责任感的事业目标和市场化的运作方式吸引了来自社会各界的关注; 富平学校不仅找到了自己最强大的合作伙伴—政府, 而且与一些著名的国际机构、媒体、企业界和学界都有合作, 富平学校在与其他部门和组织的互动合作过程中, 不断培养和建立社会网络、信任和规范, 社会资本得到培育和积聚。

总之, 作为一种新的农民工培训提供模式, 富平学校在内部管理及与外界的关系等方面都有创新, 各种创新的目标指向是为农民工提

^① E.S.萨瓦斯著,《民营化与公私部门的伙伴关系》,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2年, P66-115

供他们所需要而且能够支付得起的培训服务。但是，“富平模式”的主要意义并不在于富平学校能为多少农民工提供培训，这种模式的真正意义在于它的创新体制和示范意义，因为这个尚待市场检验的模式，提供了一种可供模仿和学习的实际典例，企业可以从中获得启发以培养其公共责任并制订员工（尤其是农民工）的培训计划；政府可以从中获得灵感，改变传统的培训政策和方式，在制定培训政策时考虑到农民工这一特定群体，对提供农民工培训的民间机构提供外在的制度维护和间接的资助；另外，富平学校还可以为其他有志于从事农民工培训事业的非营利组织提供一个参照；因此，“富平模式”对于最终确立一个公平、有效的农民工培训体系具有重要的意义。

附：

富平大事记

北京富平职业技能培训学校（下称富平学校）2002年4月成立，至今（2003年10月）已有一年多的时间；在这段时间里，富平学校走过了一段从创立到发展不同寻常的日子；回顾这段历史，可以从几个对富平有着重要意义的日子开始。

一、2002年3月18日：开始筹备学校

富平的缘起：创办富平学校是经济学家茅于軾、汤敏等人关注三农问题，扶持社会弱势群体的体现，他们根据在山西十年的小额信贷扶贫经验，从提升人力资本、创造就业机会的角度，开创新的扶贫形式，富平学校就是他们扶贫理念的延续和新的实践方式。创办者们最初的想法是在农村开办富平学校，对农村妇女就地进行职业技能培训，由于考虑到贴进城市劳动力市场有助于就业信息和机会的获得，最终，富平学校落户于北京近郊的通州开发区。

二、2002年4月18日：学校正式成立

第1期学员的开学典礼，标志着富平学校的正式成立，刚刚成立的富平学校是一家在通州区民政部门注册的民办非企业单位，它是茅于軾、汤敏等人利用非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

面向社会举办的股份制有限责任中级职业技能培训学校,学校拥有董事会(茅、汤是董事会的主要成员,股份超过50%,茅于軾是董事长),学校拥有独立的章程并规定自己的非营利组织性质,其运营收入全部用于机构自身的发展,股东不参与分红。学校的主要工作包括招生和培训两部分。

富平学校的第1期学员大多来自茅于軾等人进行小额信贷试验的山西农村,在成立后的初期,富平学校的招生方式是个人宣传和熟人的介绍,学校对学员进行一个月的培训后,就业方式采取的是由其他家政公司来分配的办法。

三、2002年8月5日:富平与安徽省政府签定合作协议

与安徽省政府签定合作协议,被认为是“富平—安徽模式”的开始。具体来说,这种模式即是安徽省扶贫办负责**组织生源**(本省贫困地区农村妇女及下岗职工)、**提供专项扶贫资金**(每个学员800元,其中有300元是交给富平学校的培训费,其余费用用于办各种证件和地方有关部门组织宣传招生的费用),富平学校负责提供一个月的**家政培训和安排就业**。这种模式是安徽省与富平学校在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城、就业方面的合作尝试,富平学校从合作中获得量多且有保障的生源以及由此而来的资金支持,有助于培训规模的扩张和学校的持续发展;而安徽省政府,尤其是扶贫办则尝试了一种全新的扶贫方式和劳务输出方式,与传统的扶贫方式相比,与富平的合作可以为农民带来切实有保障的劳务收入,增加了农民的就业机会,提高了农民的收入;双方对合作的热情都很高涨,都感到这种合作是一种创新、双赢。另外,从学员的角度来看,培训与就业方的“零门槛”(一个月的学费、生活费到上岗就业后分期交纳,先由富平学校贷款垫付)大大降低了他们外出就业的成本,因此农民参与的积极性也很高。

四、2002年10月20日:第一批安徽学员来富平

2002年10月20日,来自安徽长丰的数十位农村妇女成为富平与安徽全作后的首批学员,至今(2003年10月),全省近30个贫困区、县与富平都有合作,培训学员近2000人次,近一年来,与安徽的合作,构成了富平学校主要甚至是全部的工作内容。

富平学校与安徽省扶贫办的合作,使学校的办学规模在短期内大幅度地扩张,由此,富平学校在自身组织建设上也经历了一些调整和变迁:首先,2002年11月初成了富平家政中心,负责分配富平自己培训的学员,这样富平就从一个只从事招生、培训的单纯民办培训学校转变成为一个集招生、培训、就业等多种职能为一体的较复杂的非营利组织;组织的目标由单一的扶贫演变成扶贫兼顾市场经营;组织规模的扩大也使学校经历了两次搬迁。

五、2003年4月6日:富平一周年校庆

2003年4月6日,富平学校以研讨会的形式度过一周年的校庆。研讨会由世界银行、国务院扶贫办、劳动科学研究所和富平学校共同举办,数十名非营利组织、政府、国际组织、企业界和媒体人士参加,研讨会通过回顾总结富平模式的实践经验,探讨关于个人、民间组织与政府如何合作共同创造就业、消除贫困。

研讨会上,富平学校的创办人把过去一年富平与安徽省扶贫办以及社会各界的合作模

式,总结为“民办公助”模式,这种模式的好处在于它能发挥各方的比较优势,并形成优势互补,例如,民间机构从事培训和分配就业,效率高成本低,对市场需求的回应性较强,且富平作为非营利组织有其自身的优势;政府参与招生,信任度较高,而且运用行政系统来招生、宣传可以大大节约成本、提高效率。研讨会上,各方对“民办公助”模式给予高度评价,就以下几个方面的议题作进一步的探讨:①如何通过促进社区服务,创造城市下岗失业人员和进城农民的就业机会②如何通过民办公助(社会各界,特别是政府/国际组织的帮助)方式,提供培训机会和改善社区服务。此种模式如何能够推广③如何进一步办好富平。

(我的思考)通过研讨会的方式来开办周年校庆,富平学校的创办者是有诸多考虑的:首先,邀请各界人士参加校庆,本身即是在宣传、推销自己,也算是“营销策略”;其次,校庆又是以研讨会的形式进行,富平的创办者把学校发展中的一些困难和困扰他们的一些问题,主动拿出来展示在大家面前,共同讨论,共同寻找问题解决的方案,这是富平创办人主动寻求帮助的体现,也算是“学习策略”;再次,非常重要的一点,研讨会的参与方为富平的发展提供了可能的合作者或潜在的合作者,非营利机构的相对独立性绝不等于它可以孤立地发展,相反,对于富平这样一个由下而上形成的非营利组织,在其发展的初级阶段,迫切需要和社会其他部门、资源合作,因而研讨会提供了这样一个平台和各方合作的可能性,这可算是富平的“寻求合作策略”。此外,举办研讨会本身也体现了富平创办者的学者特色和管理者长于实践、经营非营组织的优势。

六、2003年7月1日:安徽省扶贫开发工作培训班(“桐城会议”)

2003年7月1日,安徽省政府在安徽桐城开办扶贫开发工作培训班,又称“桐城会议”,这是一次级别较高的全省扶贫工作会议(省府副秘书长、扶贫办主任及各市县扶贫、劳动、妇联部门主要负责人均出席会议);这次会议的核心议题是认可、肯定、进一步推广“富平—安徽合作模式”,安徽省政府的领导和富平学校的负责人在会上作了主题发言,在开展这项工作中取得较好成绩的五个县(区)代表在大会上发言,进行经验介绍与交流。

这是一次气氛融洽,效果明显的会议(从富平负责人整理的会议记录可以看出);首先在合作的意向上,富平与安徽省政府一年来合作所建立的信任、默契以及合作所带来的成效极大地鼓舞着合作的双方,使他们在肯定这种合作模式的同时,也十分有信心、有诚意地继续这种合作;其次在合作的具体操作上,几个县(区)的代表的发言提供了几种比较成功的操作案例,从学习先进经验的角度来看,这确是一次“培训班”;最后,针对合作中存在的问题,在学费的收取方式上变“零门槛”为“低门槛”(即规定学员入学时先交学费的一半150元,另一半学费上岗就业后再分期交纳),这一转变可能对招生数量有不利影响,但加强了对学员的约束,控制学员的流失率。

七、2003年7月10日:为期三天的员工培训(加强内部管理建设一体例)

2003年7月10日,富平学校对全体员工(主要是培训部的教师)进行了为期三天的全面、系统的培训。非典期间(2003年4月—6月),富平学校教师流失严重,管理上的一些问题,如秩序混乱、职责不明、员工素质不高等逐渐显现出来;非典结束后,学校招聘了一批新员工(主要是教师),这次针对全体员工(尤其是新教师)的培训被认为是富平加强内部管理和组织建设的重要举措。

这次培训主要分为以下几个部分:首先,富平创办者对员工进行组织认同的培训,茅于軾先生从富平学校的目标、使命谈起,激发员工投身于富平这项伟大事业的热情,使他们觉得在富平工作可以达到“挣工资养活自己”与“做一件有意义的事”的结合,茅先生的讲话重在

加强员工对富平学校目标的认同,也可以说是一种“激励教育”。其次,富平的管理者和各部门负责人全面“介绍”富平的具体工作,这部分对员工的岗前(或岗上)培训,意在加强组织管理的规范化,使每个员工(无论是招生部,培训部还是市场部)都在认同富平事业的目标下,也清楚各自具体工作的责权;再次,邀请国际基金会工作人员和从事社会工作理论研究的专家作专题发言,介绍什么是现代非营利组织,它的责任是什么,与传统的慈善有何区别;什么是社会工作,它与富平这样的非营利机构有何关系等。

八、2003年12月13日:贫困地区农民工培训就业新模式研讨会

2003年12月13日,富平学校召开了“贫困地区农民工培训就业新模式研讨会”,这次研讨会的共同发起方包括国务院扶贫办、世界银行和福特基金会。会议邀请了约60名各界人士,包括政府官员(国务院及地方扶贫办、教育部、劳动部等)、国内外非营利组织代表(世界银行、福特基金会、“农家女”等)、专家学者(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等)以及企业家和媒体人士。这次研讨会的目的是探讨富平模式及其它由民众参与、政府协作,促进社会发展和消除贫困的新模式,交流关于个人、民间组织与政府合作共同创造就业、消除贫困的观点和实践经验。无论从会议的规模、规格还是影响来看,这次研讨会对于富平学校来讲意义重大。

研讨会上,富平学校的创办者回顾了学校近两年来的发展历程,并进一步明确了富平模式是一种“民办公助”的培训—就业—权益保障一体化的农民工培训就业新模式。与会代表就以下几个方面的议题作进一步的探讨:(1)发展伙伴关系,建立“民办公助”模式,促进政府、非营利组织和民间机构的合作,共同推进贫困地区农民工的培训就业。(2)农民工培训、就业与权益保护的富平扶贫模式的实践意义探讨。(3)公共政策与公共财政如何有效促进农民工培训与就业。另外,研讨会上国务院扶贫办领导高度肯定了富平模式,并且布置安徽以外的其他三个省扶贫办的领导从明年(2004年)起为富平输送学员,同时承诺明年出资再举办一个类似的研讨会,进一步宣传富平、扩大富平品牌的影响。

我的思考: 这次会议可以视作富平在遭遇生存、发展“瓶颈”(主要表现为生源不足)的情况下,通过开办研讨会这样的形式实现其“宣传—求助—学习”战略的具体表现;会议的导向性和目的性很明显,就是在宣传富平品牌的基础上寻求有利于学校自身生存、发展的各种资源,其中最主要的是政府资源,研讨会的组织召开显示了富平学校举办者活动能力强、能量大,尤其善于和政府部门打交道,“开拓性”很强。